责任编辑:刘君健 编辑:周 创 电话:88303592
电子邮箱:yfdzbllzk@126.com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维理论逻辑

徐慧

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上升为新时代国家战略核心命题,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领域的重点任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指出,强化产业联动壮大硬支撑,树牢“链式”思维。新发展阶段需要突破以往的增长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关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动力逻辑:新质生产力引领动能重构

传统增长模式以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堆叠为核心,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该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路径依赖固化、创新弹性减弱等问题正在显现。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要素堆积型增长模式已难以满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产业体系对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集成能力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一现实命题的积极回应。新质生产力通过重塑动能生成路径的底层机制,推动增长逻辑完成从数量型到结构型、从要素堆叠到创新牵引的双重跃迁。将高潜力的新型要素融入生产过程,让科技成为驱动系统的第一变量,从而突破传统“物质—劳动—自然”三元构型。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动能重构不再从增速,而是在增质上着力。这一转变以知识、技术与体系三者形成系统的协同互动为底层逻辑,有利于盐城不断强化创新驱动抢占新风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系统性瓶颈,塑造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要素升级为基础、体系协同为保障的现代化产业范式基础,从而在高质量发展全局中发挥深层次驱动与引领作用。

结构逻辑:现代化产业体系层级跃升

产业结构是特定生产方式主导下生产要素有序组合的表现形态。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层级跃升实际是对生产方式、价值逻辑、协同机制进行系统性再组织。当前,我国产业体系在向高端跃升进程中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尚未根本扭转、产业结构向高端跃升的内生动力不足,以及跨领域、跨环节之间的协同机制存在耦合不畅等问题。

其根本原因是部分产业体系的发展逻辑仍停留在以内向型成本压缩为核心的旧有模式,未能构建起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的“链—网—场”复合组织形态。“链”是指通过抓牢关键环节和打造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有机贯通的自主可控产业链条。“网”主要强调协调主体多元、要素多样的横向协同,通过产业发展平台、技术中枢、金融接口等实现跨域立体联动。“场”的核心功能在于连接技术与应用,通过动态构建多样化场景,为技术提供持续试错与纠偏环境,进而催化其完成从点状使用、到系统嵌入、再到全面扩散的转化全过程。三者相互嵌合,共同构成具备内生演化能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与传统侧重于产业比例调整的升级路径不同,现代化产业结构跃升的本质是价值的根本性转变。盐城将数字制造和智能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数字智能产业园,致力于形成新型有机体形态。在这一新型态当中,价值创造不再依赖某个线性的单一生产环节,而是转变为线性链条到非线性、多节点的动态网络。实现这一变革,关键在于构建纵横交织的多维协同机制。纵向上需着力突破关键环节的国产化瓶颈,通过核心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根基。横向上则要依托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功能互补与空间联动,全面提升产业体系韧性及其自适应、自演化能力。

治理逻辑:多元协同的重构机制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治理逻辑,构成了产业动能转换与结构变革有效落地的制度基础。高效能治理通过系统化、法治化与智能化的制度设计,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与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跃升提供持续支撑,从而打通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再到发展动能的传导路径。与之不同的是,传统治理模式主要依赖静态职能分工,这种模式在应对产业演化日益呈现高动态、平台化和数据驱动等特征时,已显现出明显不适应性。具体表现为政策碎片化、执行环节断裂化与资源配置错位化等系统性问题,这种滞后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将相应的治理逻辑嵌入产业演化的内在节奏。而以创新为主导、以技术进步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发展模式,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特点,对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敏捷性和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治理模式需从传统的调控者转向供给者与构建者,通过提供稳定的规则框架与清晰的预期引导,为产业系统赋能。同时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活创新动能。社会系统也应通过监督反馈增强治理韧性。

制度重构致力于通过制度构型、规则联通、能力生成的三维递进,实现产业治理的底层逻辑重塑和政策效能再造。在此基础上,盐城在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时,应注重发挥社会监督与公众参与的治理效能。具体而言,在制度构建层面,立足于用法治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主体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合的发展格局,打造稳定的发展环境,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则联通就是打破部门分割和数据孤岛壁垒,利用跨层级协同机制进一步降低政策传导上的不足,从而确保各项政策在集成之后产生实际效果。能力生成层面则是以数据治理和数字平台为基础,提升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反馈速度,最终建立起一套成熟的从政策出台到实施再到优化升级的动态闭环,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点。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本文为2026年度市社科基金项目“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研究”〈26skA371〉阶段性成果)

贯彻落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学以致用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马琳琳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所在。当前,各地以“十五五”开局为新起点,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入系统深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决防止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现象。但实践中,在政府强力推动、工商资本有序下乡的背景下,部分地区仍面临村民主体性被弱化、被替代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有效机制,使市场、政府、村社形成协同效应,激活村民主体性力量,是筑牢农业强国坚实根基的关键一招。

有情村社在激活机制中的独特价值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当前分析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流框架,前者重在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价格机制、激发经济活力,后者侧重公共服务供给、破除制度障碍、建设基础设施、引导产业发展与解决外部性问题。但该框架存在明显局限,即将乡村简化为单一经济空间,忽视其生活共同体、文化传承载体与社会治理单元的复合属性,忽略了乡村所承载的人情网络、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为此,要引入“有情村社”概念,弥补现有理论在人文与社会维度的缺失。在乡村振兴中,“有情村社”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归宿,更是避免市场与政府过度介入、替代村民主体性的重要缓冲与调节力量。

有情村社是集情感、文化、自治、利益于一体的复合共同体。其一,它是情感共同体,依托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乡土情结、邻里守望与互助传统,构成丰厚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合作成本与交易费用,强化道德约束与内部信任。其二,它是文化认同共同体,承载地方习俗、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为村民主体性提供深层支撑,推动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延伸至文化传承与社区重塑。其三,它是自治互助共同体,在情感与文化基础上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依靠内部共识与习惯规则处理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内生秩序。其四,它是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共同体,以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等为载体,强调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兼顾经济效率与社区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确保发展不以破坏村社团结与文化根基为代价。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情村社的协同逻辑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情村社三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构成相互赋能、相互制衡、相互嵌套的协同生态系统。

有为政府赋能有情村社。政府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夯实村社发展的法律与经济基础,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筑牢乡村情感联结根基,避免因公共服务缺失导致村社凝聚力弱化。通过健全资源下乡民主参与机制,规范资源分配流程,防范利益俘获,维护村社公共利益。

有效市场引领有情村社。市场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需与村社共同体属性相适配。通过市场机制盘活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推动资源向高效领域流动,实现乡村资源保值增值。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等载体,健全收益共享机制,让村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由村社共同体共同分担市场风险,避免农户单独承受冲击,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个体理性与集体情感的有机统一。

有为政府保障有效市场。乡村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要素流动不畅、基础薄弱等特征,政府更需主动补位。一方面聚焦乡村市场短板,提供公共产品、完善基础设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引导资本与乡村资源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强化监管约束,健全工商资本下乡监管机制,防范资本损害农民与村社利益,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

在这一框架中,有情村社是主体与归宿,有效市场是机制与工具,有为政府是支撑与保障。所有政策与项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最终服务于村社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与村民主体性的全面激活,而非反客为主,让工具主宰目的,让支撑力量替代主体本身。

激活村民主体性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政府层面重点推进职能重塑与制度供给,强化赋能保障。推动政府从项目主导转向平台服务,避免干预经营活动,搭建县级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实行“村级申报、乡镇审核、县级备案”项目生成机制,将村民满意度、项目可持续性纳入考核。同时,着力培育赋能村集体,实施“领头雁工程”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回头看”,设立集体经济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提升村社自主发展能力。

市场层面聚焦机制创新与利益联结,激发内生动力。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在资本下乡合同中明确农民收益保障,支持土地、资金、技术等多元入股,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推行标准化合同并强化监管。稳妥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满足农户小额信贷需求,搭配政策性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乡村内生造血能力。

村社层面立足情感重塑与组织重构,凝聚发展合力。以建设有情村社为抓手,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开展文明评选与关爱服务,设立村社公益基金,常态化召开村民议事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村规民约,融入诚信守法、邻里互助、生态保护等内容,建立“诚信积分”制度,结合法治指导确保合规合法,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激发内生动力,而非单纯外部输入。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村社”三元框架,构建起协同互补的治理体系,将价值目标回归人的发展与共同体繁荣,为走稳乡村振兴道路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大丰区委党校。本文为2025年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专项课题“激活而非替代:村民主体性视域下经济薄弱村的共同富裕路径研究”〈ZX25081〉阶段性成果)

专题深思

将红色纪念场域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

刘 成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在推进过程中,如何用好红色资源、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江苏省是新四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全省拥有新四军纪念馆、战斗旧址、烈士陵园等各类纪念设施,仅盐城就有248处革命遗址和128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这些承载着革命精神的红色场域,是具有沉浸性、互动性与意义生成性的教育空间,更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然而,当前红色纪念场域在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实践中,仍面临深层挑战:一是空间价值认知不足,多数人将纪念场域视为静态资源点或教学背景,忽视了其作为教育空间的本体价值;二是学段衔接机械断裂,各学段利用红色资源时各自表述、内容重复,缺乏基于学生认知规律的序列化设计;三是馆校协同浅表化,多停留于“参观+讲解”浅层模式,未能形成课程共建、师资共培、资源共享深度协同。

以“空间濡化”理论贯穿思政课一体化全过程

“濡化”是人类学概念,指个体在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习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过程。与“教化”强调自上而下灌输不同,“濡化”强调文化环境的整体浸润和个体的主动参与。将这一概念引入思政教育,意味着教育者的关注重心应从“教什么”转向“在什么环境中如何习得”。

红色纪念场域恰恰具备“濡化”发生的理想条件:空间本身承载着真实历史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在场感;展品、场景、仪式构成多模态的符号系统,调动多重感官体验;流线设计和氛围营造,能引导参观者经历从肃穆、感动到思考、升华的情感节奏。

基于此,可提出“空间濡化”的核心概念:在特定空间场域中,个体通过与物质载体、符号系统、仪式活动和人际互动的持续接触,潜移默化地接受和内化该空间所表征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空间不仅是濡化发生的背景,更是濡化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层递进模型”:物理层的空间感知,激活具身体验;符号层的意义解读,理解历史叙事;仪式层的情感共鸣,形成共同体体验;反思层的价值内化,转化为稳定信念。四层相互交织、循环往复,共同构成“空间濡化”的完整过程。

新四军纪念场域融入思政课一体化机制构建路径

基于“空间濡化”视角,构建场域融入三大核心机制。空间意义向课程内容的转化机制。每个纪念场域都有独特的空间叙事逻辑,课程设计者需将其转换为符合教学逻辑的课程叙事。某大学以新四军纪念馆设计者鲍家声的故事为切入点,将红色建筑的空间魅力转化为可阅读、可感知的立体红色教科书,实现建筑叙事向教育叙事的成功转换。同时,将空间符号转化为教学符号,让雕塑、文物、图片承载的精神内涵成为可理解、可讨论的教学素材。将空间体验转化为学习成果,通过任务设计使短暂的在场体验转化为可表达、可评估的学习成果。

跨学段目标内容的协同机制。基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构建螺旋上升的一体化目标体系:小学阶段突出“具身体验”,通过具象故事和仪式激发朴素情感;初中阶段侧重“探究发现”,通过场馆资源理解基本史实;高中阶段强调“理性思辨”,深入分析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大学阶段聚焦“实践建构”,通过整理口述史、志愿讲解等实现知行合一。目前,盐城已经形成从“小铁钉”宣讲员到大学生调研团队的完整育人链条,为各学段衔接提供了生动样本。

多元主体联动的保障机制。建立“馆—校—政—社”协同参与的保障体系。在顶层设计上,市委教育工委联合市委宣传部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对革命传统教育作出总体谋划,开展“五个百”活动;在馆校共建上,高校与新四军纪念馆等纪念场馆成立共建联盟,实现课程共建、队伍共建、质量共创;在数字资源共享上,建成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新四军红色资源数据库,以数智赋能教学。

从历史场域到空间浸润的实践逻辑

进行空间叙事转换,让纪念场域成为“可阅读的立体教材”。既要解读建筑语言,将纪念性建筑的象征意涵转化为历史叙事;又要进行展陈叙事的课程化改造,将场馆叙事与课程目标对接。某中学以校园红色广场的构造引入课堂,用带有红色元素的地砖、纪念石,唤醒学生对家乡红色历史的感知,实现校园空间叙事与思政课程的有机融合。

推动分学段浸润设计,构建螺旋上升的体验序列。小学阶段以“文物+宣讲”模式培育“小铁钉”宣讲员;初中阶段构建“参观—感悟—践行”育人闭环;高中阶段将红色研学与励志教育结合,组织学生徒步前往新四军纪念馆,将高考冲刺与先辈革命征程相连;大学阶段组织学生走进长三角31家新四军纪念场馆开展调研,从受教育者转变为研究者、传播者。

推广“行走的思政课”,打造多维联动实践模式。高校精心打造“坐标课堂、田野课堂、云上课堂、成长课堂”全链条实践大课堂。“红领巾对话铁军魂”等活动项目,创新构建“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网络云课堂”三维联动模式,让静态革命文物真正活起来。

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拓展空间浸润时空边界。利用VR/AR技术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走进历史场景;建设红色资源数据库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将线上学习与线下实践有机结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闭环。

新四军纪念场域作为承载新四军精神的红色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政教育价值。实现从历史场域到空间浸润的教育转化,需要在机制、路径、保障三个层面协同发力。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以“铁军魂 盐城红”思政教育品牌为引领的系列实践,为这一理论模型提供了有力实证。扎根红色沃土,赓续红色基因,将新四军革命精神融入青少年血脉,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课题“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框架与赋能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的实践探索”〈2026B119〉、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专项课题“空间濡化与机制构建:新四军纪念场域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路径研究”〈26xsj82〉研究成果)